

淮陰縣文史資料

13



第四輯

9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
淮阴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94237/04

淮 阴 县 文 史 资 料

第 四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淮阴县委员会
文 史 资 料 研 究 委 员 会 编

一 九 九 〇 年 二 月

目 录

一、坎坷漫长的道路（下）

——记我军最早的女兵之一王鸣皋

……………王鸣皋口述张恩儒主笔 1

二、蒋集、袁集地区（1927—1958）革命史料纪略

……………蒋袁区革命史料写作组 32

三、抗战中福州战役的点滴回忆……………安守仁 63

四、王营清真寺简介……………戴庭 徐九皋 67

五、淮宝地区小刀会的活动……………曙东 75

六、英国基督教南长老会在清江浦的活动……………马牧英 83

七、韩信文物古迹简况……………马牧英 101

八、乡梓万里情

——记巴西华侨蒋孙玉庆女士捐资办学的事迹

……………张业恂 109

九、在淮阴籍著名学者孙旗……………孙智悦 谈洪轩 112

十、中国国民党淮阴县党务组织沿革概况……………冯治 115

十一、在台著名的淮阴籍作家——司马中原……………刘云碧 120

十二、古寨镇匪乱目击记……………朱笑山口述 朱展东整理 122

十三、古代诗人咏淮阴……………张业恂辑 126

坎坷漫长的道路

(下)

王鸣皋口述

张恩儒主笔

编者按：文史资料第二辑刊登了《我军最早的女兵之一王鸣皋》一文，各方面反映较好，要求继续能刊出续编，现下篇经张恩儒同志已整理成文，特此刊完，以飨读者。

七、上海春野书店遇险

我和胡毓秀都没有到过上海，谭勤先当向导，带着我俩游逛上海，走到外白渡桥时，突然遇到从武汉一同去广州的八一南昌起义行军中的十一军政治部的秘书罗懋旗同志，在他引导下，走进了春野书店。我们能在上海和他见面十分高兴，特别是谭勤先，更是喜出望外，激动地拉着他的手说：“懋旗，我做梦也没想到这一辈子还能看到你！”原来，他们在行军中就互相倾慕，但在紧张的行军战斗环境中谁也没有吐露，在上海相遇后不久就结婚了。

春野书店座落在四川路，鲁迅曾来过这店。啊，在这里我们见到了赤色诗人蒋光慈，还有钱杏村（即阿英）、杨村人等，听介绍我们是辗转来自武汉分校的女战士，大家表示热

烈欢迎。大家都叫蒋光慈为总司令老大哥，由他发布命令。他说：“你们也不必回江西或湖北去了，就在这里，有饭吃，有工作，还有党！”他不经我们同意，就派人到船上去把行李搬到书店。潮州失利后，和部队失去了联系，在群众协助下，我们又找到了党。

在春野书店住下后，中共中央交通员霍步青前来接头。把我安排在党的一个秘密机关当剪报员，任务是把每天的报纸上有关工人罢工或农民暴动、学潮及其他突发事件等消息，剪下贴在一个本子上。后来又分配我和胡毓秀担任《太阳月刊》的校对员。《太阳月刊》撰稿人有蒋光慈、钱杏村、郁达夫、楼适夷、孟超、王艺中（又名王雪夫）等。在上海春野书店工作中，分配我校对美国作家的童话集《玫瑰花》，译者是王艺中，译笔流畅优美。经罗懋旗等人的介绍，我与王艺中结识后不久就产生了爱情。

本来，我解除封建的包办婚约后，曾与二表哥左家德相爱，并许以终身之约。但是，由于大革命失败，我被迫出走，两人天各一方，无法相聚。在上海遇到大表姐宋伯筠时，表姐告诉我说：家德已经同一位姓杜的姑娘相爱了，这使我内心十分痛苦，就给二表哥写了一封信。不久，回信来到了。信上说：“自部队出发后我就回了家，这半年期间谈了一段小小的恋爱……”这封信给杨村人看过后，他说：“算了，他既然有了人，你就别在想他了！”我随即回了封信，表示与左家德切断感情联系。这时，钱杏村、杨村人积极为我介绍孟超，但是听说孟超已有妻子，而且有了小孩，因而对他产生了不好的印象。每当他那双象钉子似眼睛盯着我时，我感到不自然。他时常献些小殷勤，请吃饭，看电影等，这更使我不快。他提出要与我家乡的妻子离婚，我表示坚决反对。有一

次我病卧在床，他在我的门外徘徊了一夜。第二天写了一篇散文《她病了》，写得娓娓动人，我佯装不知，不为所动。然而，此时此刻，我却想起了当初是多么爱二表哥家德啊！每年寒暑假，他都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帮我补习国文、数学、英语，使我能在短短的三年半时间内取得学业上的长进，是他努力帮助的结果，又怎望轻易地忘记他呢！

孟超对我的爱是真诚的。他知道我爱看电影，每有新片子，他都要买票送来。可我，只要知道是单独请我个人，就一概拒绝。因此，他每次都要拉上钱杏村或蒋光慈等。有一次，由于看电影，竟使我避免了一次灾难。事情是这样的：初到上海时，我给家里去了一封信，说自己活着，而且到了上海。信的内容不知怎的却被敌人知道了，上海警备司令部派密探来打听消息。有一天，书店一个店员告诉我：“有个湖北人说是你的同乡，住在四马路五州旅馆，有紧急要事，要你去见他。”我想不起来有这样一个同乡，能有什么要事呢？准备下午去。当我正要上电车时，孟超来了，说：“今天下午有个好电影，卓别林的《淘金记》，我买了七张票，跟大家一起去吧！”我说：“不行，我要去四马路会个人！”他说：“第二天去嘛！”在他的说服下，就没有去五州旅馆。第二天下了雨，又没有去成，一直过了两个星期，早已忘了那回事。这天早上约七点钟，春野书店的小店员跑来说要下乡看望母亲，请我替他照看柜台。我到达书店时有的人还没有起床，就边照顾营业边看书，蒋光慈也在旁边看书。忽然，外边进来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盯着我问：“这里有个王明高吗？”我抬头一看并不认识，顿时警觉起来，稳住神回答说：“有个王明高，他不在这里，你会他有什么事吗？”那人冒火地说：“我约他几次到我那里去，他为什么不去？”我从容地说：“今

天他没来，有什么事情你留个条子，我通知他好了。”他看都不看我一眼，随即向门外招了招手说：“进来！”一下子闯进来十多个提着枪的人，后门早已有一辆汽车等着了。蒋光慈见事不好，拿了本书到我面前交了钱，转身走了。另外几个徒弟和来看书的小朋友想走已经迟了。拿枪的人横眉瞪眼说：“一个不准动！”他们楼上楼下乱翻一通，把睡懒觉的姚杏村、杨村人、胖会计等十多个人，统统从后门押出，装进了汽车里，另外还抱了一捆来往信件，也装上汽车拉走了。剩下我一个人还在门口站着，那个先来的男子又问我是什么地方人，叫什么名字，在哪里住，做什么事等等。我坦然地告诉他。老家湖南，叫严桂芬，到上海来读书的。他问我有个严某某是不是你的哥哥？我回答说：“不是。”心里很紧张，表面上却从容自若，回答得毫无破绽。最后，他将我上下看了遍，说：“好，你不要怕，带去的那些人只要问清楚了不是王明高，就会放回来的，你给他们看门好了！”说完就扬长而去。

我吓出一身冷汗，急忙拿了儿角钱，锁了店门，象困鸟出笼一样飞跑到电车站，买张通静安寺的全程车票，到法租界路口跳下车，径直向王艺中的住处新新里跑去。见了王艺中，不由泪如雨下，立即投入他的怀中，将春野书店发生的情况向他叙说了一遍，当天二人即结成了夫妻。此事发生在1928年3月份，王艺中当时是中共中央的英语翻译。我因只身逃出，除了身上的衣服，什么都没有带。过了几天与胡毓秀联系，她送来一床棉被。一周后，她看见《新闻日报》或为申报上发出一则启事：“春野书店股东王鸣皋，是个共党分子，现本店郑重声明与其脱离关系，所有股本一百四十元，没收充公”。后来大家一致否认与王鸣皋有任何联

系，甚至连那个小徒弟也说不认识王明高。这样，虽然过了关，但是，书店却从此不能活动了。

新新里在法租界，附近有新华艺术学院和政法学院。这两所学校有许多贵州和四川学生，形成一个川黔同乡会，与王艺中和我有过来往的有向茵谷、葛克嘉、段习生、周潮生、向心力、秦松桥、平锡如、李白根、黄春华、冯国文、王一之、王贵昌，还有一脸麻子的丛美。在这里居住期间，我改名袁余芳，进入上海艺术大学暑期补习班学习，授课的教师有创造社的王独清、冯乃超、李初梨等一批具有新思想的人。学习结束后，我思想很苦闷，由于怀孕，既没有正式职业，又不能继续学习，暑假后即搬进徐家汇附近一所农民房东家去住。当年的五月，日本帝国主义在济南杀死了蔡公时，许多留日学生纷纷退学回国，以示抗议。住在这里的就有从日本回国的向心力和他的弟弟向贤才，另外还有葛克嘉、平锡如等七八个青年。大家集体起伙，向心力做饭，茵谷烧菜，王艺中洗碗。伙食费是谁有钱谁拿，没有钱的就白吃。当时有固定薪水的只有王艺中一人，其余都是靠家庭寄钱，我的母亲设法寄来了二十元钱，全部被王艺中周济给了彭仲平。我担心孩子出生后无钱养活，说服王艺中去医院打胎，而且预交了十元钱手术费，由于秦松桥等的劝阻，才没有将孩子打掉。

八、表姐夫竟然是叛徒

伏天的上海，白天异常闷热，黄昏后才有海风吹来，因此人们都愿意晚上逛马路。一天傍晚，我和爱人王艺中散步到霞飞路口，突然遇到了大表姐夫戴寒光，戴寒光一把拉住我们说：“可见到你们了！我找了你们好几天，就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住。”有半年多没见面了，我很高兴。他西服革履，身

上焕然一新，使我感到十分惊异，便问他在什么地方住。他兴致勃勃地说：“就在附近，走，到我家去，你表姐正在想念你们呢！”我和丈夫高高兴兴地跟着他，走进一座高大的洋楼正门，上了楼打开一个房门，更使我们惊讶不已。当时在上海的文化人和地下党员，一般都是住价钱便宜的亭子间每月租金七八元钱，而前楼的租金要高出一两倍。戴寒光的屋子陈设堂皇，有穿衣镜，红漆桌椅，钢丝床等。我感到很奇怪：他哪来的钱住这样的房子？戴寒光似乎意识到了什么，立马解释说：“最近几个月，党派我任《新闻报》编辑，每月八十元钱工资。”说完又转换话题说：“二姐夫胡雁冰也来上海了，明天我去约他来，大家照张像给家里寄回去。”我们夫妇高兴地同意了。

第二天我们去寒光家吃午饭，二表姐宋仲芳和表姐夫胡雁冰也去了，大家去照相馆拍了照，又去看了电影，直到夜晚才回家。分别时我们夫妇约戴寒光明天到徐家汇来吃饭，戴寒光满口答应。哪知第二天等了一天，也不见他来，还认为他现在混得不错，不来是瞧不起人，准备责备他失约。第三天，又去找他，一见面他就说：“你真害人，昨天我将徐家汇都走遍了，也没找到你们，是不是住处保密呀？”哦，我恍然大悟了，他是在街面上找的，没想到我们是住在靠近徐家汇的农村，当然找不到。当下，他还十分机密地告诉我一个令人心惊胆战的消息，他说：“鸣皋，你要注意！沈革飞叛变了革命，他以前曾经想同你谈恋爱，你不同意，现在他声言，无论在哪里碰上你都要打死你！”他见我神色很不安，又说：“你以后白天最好不要上街，晚上出来也要化装！”我信以为真

买了一顶外国女人戴的呢帽，戴上后将头埋下一点儿就看不到脸了，而且白天不上街。一天早上，我突然看到报上登着一

条戴寒光被暴徒刺伤的新闻，我的心跳加速了。再仔细往下看时，却原来是戴寒光已投靠了敌人，成了南京政府的特务，南京派他到上海来调查共产党的活动情况，地下党派沈革飞监视他，计划将他除掉。想起近来与他的接触，他的言行，虽然他是知道王艺中在中共中央当翻译的事，而且是在企图通过自己和王艺中钓更大的鱼，不由吓出一身冷汗。一个星期以后，我在报上又看到一条消息：某清晨五时许，戴寒光自保隆医院出来，拟到南京去，走到医院转角处，被暴徒狙击毙命，他的夫人宋伯筠亦受重伤。后来听说，戴寒光每出卖一个共产党员，得到二百元大洋的奖赏，他一共出卖了二十个人，把团中央整跨了，我的二姐宋仲芳是团中央的干部，也被捕了。地下党员在对他执行死刑判决时，本不打算伤害宋伯筠，可她竟护着丈夫大吼大叫：“我认识你们是什么人，不怕你们化装！”在这种情况下我地下党员才不得不对她开枪。我听到这个消息，十分痛恨表姐不该维护反革命的丈夫。

在当时的上海，惩办叛徒，是中共中央建立的特科进行艰巨复杂斗争的一个部分，为保卫中央领导机关安全，了解和掌握敌人动向，向苏区通报敌情起到了巨大作用。

1929年初，我生了一个男孩，当爸爸的给儿子取了个小名叫“罕默—HAMMER”的译音，意即铁锤。由于无线进妇产医院，只好将王艺中在张家口买的一条俄毯送进了当铺。出院时地下党补助了十元钱，才将孩子抱回家中。七月，听说二表姐宋仲芳被关在龙华监狱，改名王秀兰，并决定去监狱探望。一天下午，买了些糕点水果，抱着孩子，乘人力车到了龙华监狱。看守监狱的一个小头头问我找哪个，我说：“找姐姐王秀兰，我叫王秀英。”那个小头头满高兴

地打开了栅门，甚至有点儿献殷勤地喊道：“王秀兰，你妹妹来了，快出来吧！”不一会，宋二姐在一个连头都钻不出来的小洞口里露面了。我情不自禁地哭出了声，心里的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二姐也哭起来，孩子也吓哭了。最后还是监狱看守以啼笑皆非的面孔提醒我们，止住了哭泣。我不敢公开说出心里想说的话，只能问二姐身体怎么样？还需要什么东西下次好带来。那个看守狡诈地说：“不要带肉食，只带些蛋糕、皮蛋之类就行了！”二姐厌恶地暗示：不要理他。接见时间到了，那看守头头送我出来，笑嘻嘻地问我家在什么地方住，以后他要多帮忙，还要到家里去看我等等，并且还十分亲热和机密地说：“只要你能向你姐姐说，‘她肯嫁给我们监狱长，她就不会再坐牢。’”我心里非常气愤，但表面不得不应付说等慢慢劝说。一个星期后，我正在水塘边洗尿布，那个监狱看守头头突然出现在我身旁：“哟，王小姐你就住在这里吗？”我吓了一跳，假装不认识，问：“你找哪个？”他皮笑肉不笑地说：“你忘了吗？你姐姐要我带信来给她买蛋糕啊！”“噢，你是监狱的对不起，我忘了！”他又问我“家中还有什么人，你丈夫在家没有？他叫什么名字，是不是作生意的”等等。我心里很紧张，应酬说丈夫是作生意，才从山东回来，等几天全家还要去看姐姐，那看守见我冷淡，搭讪着说：“没有什么，我不过是路过这里，看到你才把信带到的，还是希望你帮忙把话说给你姐姐，事情办成了，监狱长会感谢你的！”当时敌人的特务、密探无孔不入，我怀疑敌人在设圈套，就向王艺中说明了情况。均感到问题严重，便设法搬到了闸北去住，从而躲过了敌人的纠缠。

九、飞行集会

自从有了孩子，我参加党组织的活动受到一些影响。但带着孩子却又起了掩护工作的作用。

当时，上海党的组织，错误的认为革命形势仍在继续高涨，反对退却，要求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继续组织进攻。指示要经常组织暴动，搞一些“飞行集会”。有一次我与四、五个人去参加“飞行集会”，别人替我抱着孩子，传单由我一人带，裤管里、衣襟里都装满了宣传品。上电车时，就被特务盯了。我暗示王艺中和其他同志，都来想法甩掉尾巴，从法租界到大世界换车时该我上车了，我故意的在原车上迟迟不动身，那特务就慢慢朝我这边移动，车快要开时，我突然跳下车抢上电车，乘车走了，其他几个同志紧跟着那个特务。特务发觉他被几个人盯着了，吓得赶快逃走。当我随身携带着宣传材料，安全的和几个同志集中在一起时，他们是又说又笑，还是人多有办法。最后参加“飞行集会”的同志在杨树浦工厂区的菜市场重新集合，正赶上工人下班，几条街道同时涌来成千上万的工人。突然信号枪一响，“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响彻大街小巷，我们几个人，将携带来的宣传品分别交给前来接应的同志，分头四处扬撒散发，一刹时，红红绿绿的纸片满天飞舞，趁这机会地摊上、铺子里，到处都是，行走的人随处都可得到传单。发表讲演的同志抢占制高点，大声向群众演说。不久，反动派知道这里在搞“飞行集会”进行宣传活动后，慌了手脚用车运来反动军警，满车的武装军警纷纷跳下车，挥动警棍和枪托乱打一通，另外的一批军警即拚命捕捉那些来不及躲避的人，我接过自己的孩子，正要跑开，却见提

着菜篮子的王艺中被几个警察捉住，正在往车上拖，我不顾一切地扑上去，大喊大叫地说：“我们是来买菜的，你们为什么随便抓人？”那个警察以为抓错了人，猛踢王艺中一脚骂道：“滚蛋！”我们脱险了，满街人群四散奔走，还是有一部分人被捕了，整整装了两卡车。

在敌强我弱，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搞这种“飞行集会”式的宣传活动，虽然能起着一定的宣传作用，但必然要暴露一些同志，使革命受到很大损失。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直到1930年9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时才结束，

1929年8月，我请同楼住的邻居照看孩子，自己报名到华南大学去听课。这是进步人士在闸北利用劳动大学的旧址，新开办的一所学校，校长是潘梓年。这里的学生多数是原来军校时的同学。我感到无比欣慰，仿佛又回到了武汉大革命时代的大家庭，可以跟同学们自由的说话和讨论中国革命所遇到的一些问题。但是在反动政府控制的上海市内，他们是不能容忍革命人民的民主和自由。反动派很快就来找麻烦，刚刚开课三天，特务就把汽车开来了。

这天早晨，头堂课的铃声还没响，我正准备进课堂，忽然看到几个贼头贼脑的家伙在校门口东张西望，我警觉地跑到楼上向潘校长报告说门口有特务。潘校长沉静而又温和地说：“不怕，你们先去上课！”他跑下楼，质问那些人来到学校闹什么。这时跳上来几个手执兵器的士兵，其中的一个小头目大声威胁说：“你们都是共产党，现在要查封学校，谁敢反抗就立即逮捕！”潘校长不慌不忙地走了过来，镇静地向同学们说：“同学们，请大家安静，不要吵闹，听我说几句话。”同学们立刻静了下来，等待着校长讲话。潘校长含义深刻地望着大家说：“天气是这样的闷热，令人难以忍

受，暴风雨不久就要来到了，大家暂且忍耐一时吧，现在请同学们解散，以后有机会再来上课！”那些特务楼上楼下乱翻一阵，没有找到什么有用的证据，只把一些信件和课本抄走了。就这样，短短几天的华南大学被查封了。

后来，王艺中的翻译工作也停止了。在徐家汇，有个日本人办的同文书院，赤水县人葛克嘉（人民日报社长秦川同志大哥）在那儿读书，经他介绍，王艺中去该书院学习日文。有一天，我上街买菜，遇到了从苏联留学回来的段子良，谈到了袁家大姐袁浦之，她们一同从苏联回来，大姐被分配去安徽工作，走到安庆时被敌人逮捕了。我心里非常着急和难过，但又无法营救。当天晚上段子良到家来，详细说了大姐被捕的情况。不想王艺中从学校回来，听到屋里有男人说话，一气之下又跑回了学校。第二天他回来时脸色很难看。见面就说：“你要嫁人就正大光明地嫁，不要偷偷摸摸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也冒火了，大声说：“孩子不是我一个人的，谁要我嫁谁？你说明白！”“昨天晚上谁在这儿了？”他气冲冲地问。我这才明白事情的原委，不免又好气又好笑，就将段子良来过的情况告诉了丈夫。王艺中听后释然地说：

“我真以为你看我生活无着就变了心呢！”

孩子罕默八个月的时候，借四川同学冯国文和黄春芬夫妇回重庆之便，将孩子带到重庆，由老人接回赤水县老家去了。我想从此安下心来学点儿东西，原本想学接生，找一条谋生之路，因交不起一百元学费而作罢。王艺中要我去新华艺术大学，说那里有不少熟人，毕业后可以去教学。于是，我改名王新华，进了新华艺大。这里果然有不少熟人，如王一之、王贵昌等，冯国文、黄春芬虽然已经毕业离校，但我与他们介绍认识的同学都相处得很好。在这里还认识了共产

党员杨庆义，他的姐姐杨秀义是我在军校时的同学，杨庆义也带来了组织关系，我们形影不离。另外还有一位四川的男同学，姓吕，一起编成一个党小组，过组织生活。经常拿些传单、标语等宣传材料，在学校散发，有时深夜上街张贴标语，也有时到附近工厂去作宣传工作。在校内还演出了进步戏剧，在排练田汉的剧作《少奶奶的扇子》时，我被选派扮演丫环。

十、地下党的训练班

1930年春天，由于没钱交学费，我不得不离开了新华艺术大学。想进另一家戏剧学校，又想应征去当家庭教师，结果都碰了壁。这时杨庆义告诉我说：“上海赤色互济总会要开办训练班，这是党的地下组织办的，何不去那里工作？”（据人民日报82年2月18日介绍，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潘梓年同志当时也在党所领导的进步组织上海互济总会工作）。在这同时，王艺中也恢复了工作，从事打字。经过联系，党派我去找房子，开办训练班。我以满腔热忱去工作，在法租界赫德路找到一幢新修尚未完工的住宅，立即租下一楼，连厨房共有四间，备有电灯、自来水、抽水马桶等新式设备。以轮船公司的名义租房，把总会的用俱全搬了来。党还派来一位烈属妇女，帮助收拾房间。前来学习的人都是地下党派来的，由我去接，那位烈属女同志由于有病，行动不便，只能在家看看门，有时也烧饭，上街买菜打杂的事都是我负责操劳。训练班为期一个月，经常来讲课的，我只认识周恩来和邓颖超，其他我都不认得，党的纪律是不许打听也不准问。第一期学员三十人，因为是秘密活动，白天不能出楼房，结果抽水马桶出了毛病，

屎尿流溢，引起了左邻右舍的不满，大兴问罪之师。我只好向四邻道歉说：“乡下来了些客人，不会使用抽水马桶，很对不起，我负责请人修理！”说罢连忙去帮助邻家清扫粪水。左邻住户一位男主人过来察问是啥原因，我一看原来是暑期补习班的教师冯乃超先生，便立即上前去道歉。冯先生一看是我，似乎明白了什么，就没有要我去打扫，还十分关心地嘱咐说今后要注意。抽水马桶不能用了，我去买了一对粪桶，好在每天都有人来收粪。由于每天都要出去买菜，引来了周围居民的注意。有的问：“你家有多少人吃饭，为什么买那么多菜？”我只好蒙混说是给船上的人员买的，轮船不久就要返航回来，恐现买菜来不及。第一期训练班结束后，学员们都分配到各省从事革命工作去了，我依然留在这里。又怀了孕。

不久，训练班开始接收第二批学员，为了防备敌人的破坏，我更加小心谨慎。有一回我带来几个新学员，下了电车就叫他们先在一旁等一等，自己先回去察看一下，没有问题再叫他们。当走到弄口时，看到有几个人正站在不远处向我张望，我顿时紧张起来，奔到训练班门前连敲三下，却无人应声，头上冒出冷汗。这是事前定的暗号：关着门时，来人即连敲三下，若无回音即表示有问题。当下我迅速离开，先跑到彭湃烈士家里将文件藏好，然后又把那几位学员同志送走。结果这却是一场虚惊，原来是看门的人睡着了，没有听见我敲门。

彭湃烈士的爱人就住在训练班附近，我手里的文件多半放在她那里，需要的时候去取。以后，党让我专门保管赤色救济总会的文件，实际上就是党中央的文件。文件装在三口漂亮的大皮箱里。有了这样三个堂而皇之的皮箱，可就无法

再住蹙脚的破房子了。因而，我们也住进了前楼的大房间，每月房租十元以上。住这样的房子有一条纪律：除了交通员一人可以来往外，其他任何人都不准进入，遇有情况，立刻搬家。好在行李简单，一部包车就可以装下全部家当，搬家并不难。因而在一个地方最多住半个月，有时一个星期搬一次家，经常住新房子，倒也有趣。后来由于临产，我不得不住进了红十字医院。当年动员我投考淑华女中并陪同我去樊城的雷德英、雷文英姐妹俩，就在这家医院里当护士。由于我把王新华这个名字又改成了王国民，她们不大敢认我。当我问她们什么时候离开老河口？雷德英回答说：“从你离开老河口后，我们即考取上海护士学校。”我不知道她们的政治态度，相认后也不敢深说什么；而她们是由教会保送到上海护士学校学习毕业后当的护士，都是忠实的基教徒，她们也明白我是什么人，也不便多问。由于思想上隔阂，大家相见也只是表面上的亲热而已。

住院一周后，王艺中来到医院突然对我说：“家里出事了，那些东西都搬走了！”我吓得面色苍白，知道所谓“那些东西”就是指的党中央的三皮箱文件，便迫不及待地问：

“到底出了什么事？”他不愿多说，只轻描淡写地说：“关系不大，你好好休养，等出院后再说。”可我哪里能安下心来，说：“人是小事，中央文件是大事，我马上出院。”王艺中见不告诉我不行，为了让我留院作手术，只好讲出了事情的原委。原来是自我住院后，他一人在家里呆得无聊，有时就出来在附近走走。一天在外边遇到了老朋友秦松桥，他请他进屋里坐，刚说了几句话，中央交通员就来了，看见有外人在，交通员回去就向上级报告了情况，中央当机立断，马上派人来将文件转移了，并且宣布撤了我们的职。听了这番